

政治大學史薈第 57 期
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三年(2024)九月

評詹姆斯·斯科特《反穀：早期國家的深層歷史》

(臺北：麥田出版，城邦文化發行，2019)

歷史四 彭雅庠

詹姆斯·斯科特(James C. Scott)，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。美國當代政治人類學大師、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。現為耶魯大學政治學史特林教授、土地研究計畫的共同主持人。重要著作有《國家的視角》(*Seeing Like a State*)、《弱者的武器》(*Weapons of the Weak*)、《不受統治的藝術》(*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*)等。

翁德明，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學士，法國巴黎第四大學法文系博士，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。重要譯作有米蘭·昆德拉(Milan Kundera)《玩笑》(*La plaisanterie*)、《被背叛的遺囑》(*Les testaments trahis*)等。

一、摘要

《反穀》這本書旨在追溯早期文明人們定居行為的發生，並探討國家興起的要素，以及人群移動的發展情況和原因。此外，作者亦藉由文明國家和野蠻社會的對比，討論雙方來往互通的可能性。以下，將先概述本書要旨，再發表個人心得、反思。

全書分為八個部分。首先作者於導論表明這部著作在探究「農業與生態複合體的起源、結構與後果」。他主要從定居行為，以及農耕、採集、獵捕和游牧等面向，提出對傳統史觀的質疑。並在文末簡述本書的各章概況。對本書的了解有提示作用。

總結本書各章，第一章到第五章，旨在說明人類起初聚集的情況，及進到農業社會後的影響；而第六章與第七章則揭示人類從國家核心區向外遷徙，而後重新拼組的社會情況。

第一章先從人類掌握用火技術說起，指出火除了有煮食功能，還是改造地景、獵捕動物或游耕的工具。接著，作者舉證解釋定居行為的時間點，早於農業社會的興起，且先民會隨著環境變化，獲取各樣資源而不限於對農作物、家畜的需求。

第二、三章以人口集中到總量的增加，解釋人類進到農業社會的適應和改變。人類興建農莊將農作、動物、人類都集中起來，在馴化植物、動物的同時，也因農莊的農事規約、儀式活動馴化人類自身。而社會非菁英階層雖可能面臨糧食、疾病、勞役等壓力，廣泛定居的農民卻又有更可觀的生育率，讓人口總數呈現正成長狀態。

當人口集中與定點農耕結合起來後，國家就有了組成的條件，因為穀物和人口，分別是國家重要的收入及人力資源。循此脈絡，四、五章進一步解釋國家如何將稅收與勞役來源一把掌握，一方面制定方針防止人民脫逃，另一方面也積極向外搜索非自由人口，以填充勞力。

第六章從國家的脆弱性說起，而不論是疾病、人為生態破壞、徵稅，或戰爭等，都可能是這個脆弱性的原因。它並不會因向外尋求非自由人口就能解決這種根本性的問題，反倒因脆弱成分的日益積累而導致國家的崩潰，從而使人民向外遷徙以尋找更好的生活。不過國家的脆弱性，乃至所謂「黑暗時代」，並不一定是件壞事，反倒是人口重新拼組的契機。

第七章主要討論國家周邊游牧民族的議題。不受國家控制的游牧民族，對國家會有掠奪、戰爭、貿易等來往，而貿易可能更顯重要。此外，自國家脫離的人口也可能成為游牧民族的一份子，與文明國家進行戰爭、貿易等交流，甚至成為建立野蠻王國的推手。然而游牧民族又可能互相攻掠，或是出售自己的軍事技能作為鄰近國家的僱傭兵，而消解野蠻王國持續壯大的機會。

二、評論與分析

綜觀本書書寫結構，每一章節皆是獨立的主題，但又相互連貫。整體而言，作者將人口集中與農業的發展進程，導向國家的形成，並在國家日益茁壯之際，也點出國家激發出人民向外擴散的因子。它的原因來自國家本身的脆弱性，起初或許可以藉由向外尋求人力來填補缺漏，但終究無法防止國家的崩潰，阻止人民重新組織。人們因營生策略而有不斷移動的可能。可見作者在核心與邊陲的檢視，可謂獨具慧眼，他道出早期國家興起的要素，及當中的侷限性，同時也對游牧民族的活動，和人群移動的情況提出歷史想像。

而若細品本書，可發現本書的各個角落，都能看到作者多方以新奇的觀點吸引讀者。比如在第一章中，作者藉由濕地理論，提到肥沃月灣近海地區的定居聚落，不是以農耕作為主要的食物來源，他們的飲食習慣非常多元，以採集、獵捕動物為主，農耕或是馴養牲口不過是他們的副業。這層觀點與過去習慣「農耕和定居息息相關」的認知有所差異，農耕不見得是定居的必要條件，且定居行為可能早於農耕活動。

第二章討論農莊組成的問題時，他提到人類實在馴化植物、動物，乃至整個環境的過程中，也馴化了自己。人類因農莊的經營，培養出一連串的農事規約、儀式活動等，間接失去像採集者、獵人般的自由度和靈活性。此處，作者注意到人類在集中過程時也讓自身逐漸服從規範，而若是越下層的階級，自由的程度可能只會越低。農業社會的進展，實際上讓下層人民更加不自由。

第四章談穀物如何造就國家時，作者指出穀物的大量種植，是國家建構的重要基礎。穀物的大規模培植不是為了讓人們溫飽，讓人民过上豐足的生活，而是能作為有效的稅收基礎。因穀物方便運輸、儲存、計算及成熟期一致等特性，使國家有可靠的稅收來源，同時也能作為買賣時的價值標準。於此可見，

作者認為穀物耕作反而有助於國家剝削人民的情事，人類進入農耕社會看似進步，不過那些下層的生產者，往往被上層階級當成利用的工具。

另外，作者對人群分散和重組也有獨到的見解。如六、七章談國家的脆弱性時，指出人民實際上會為了營生趁機脫離國家束縛，甚至擺脫農業生活，成為游牧民族的一部份。這有別於過去認為國家衰敗便民不聊生的觀念，當國家基礎被撼動，人民實際上有更多自由的選擇，人們為了生存，國家意識未必如此強烈。

然而，儘管這本書在人口集中、早期國家的建構與崩潰等處都頗具新意，但他的論述邏輯恐有不周之處。

作者在論說早期國家的面貌時，雖然主要論述來自對兩河文明的觀察，不過也少不了援引中國、埃及等文明的材料加以舉證解說，其實某種程度上，就顯示出他將世界各地的歷史一概而論的可能。從全書的中心意涵來看，我們並不難看出作者西方本位的史觀，以致於在詮釋論點時恐有不臻完善之處。此處可以試舉作者對「國家」的定義來談。

作者認為國家是農業現象的產物，看起來像散布在沖積地形上的小群島，而儘管國家意欲成為強大勢力，他們的勢力所及，始終只能奠基於提供充足勞力、豐厚糧食的沃土。¹在此種情境下，作者指出人民會試圖逃脫國家徵稅、徵兵或流行病，而放棄農耕，回到採集或畜牧的原始生活，且不能否認，沒有國家屏障的生活，免除了身在城市中心所帶來的威脅。²從上述資料來看，實際上就凸顯了一個問題：人民是否為了更好的生活而逃離國家，以及他們的營生模式是否就是採集、畜牧？這個問題，或許放到西亞的文明國家便容易解決，但是若套用到東亞文明，或許不能太早下定論。

首先，若「國家」指的是所能掌握的城市，那麼人民的移散，或許可以視為都市往鄉野移動的過程，如此擺脫城市控制並非毫無可能。如從山本真的研究可知，縱使到了清朝乃至民國建立，國家對山林的管控仍十分有限，光是福建林地登記面積，就遺漏廣大無主地的估量。³因此人民若真要擺脫城市生活

¹ 詹姆斯·斯科特(James C. Scott)，翁德明譯，《反穀》(臺北：麥田出版，城邦文化發行，(2019)，頁 258。

² 詹姆斯·斯科特(James C. Scott)，翁德明譯，《反穀》，頁 246。

³ 杜正貞、佐藤仁史主編，《山林、山民與山村》(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20)，頁 210-211。

壓力，中央政府鞭長莫及的山林或許就是個選項。可是，他們的營生手段是否放棄農業而從事採集或畜牧卻有待商榷。

的確，我們當然不能排除原始生活的可能，但至少透過長沮、桀溺或陶淵明避世耕種的故事，可以告訴我們國家雖處在政教崩壞的時代，農耕也不見得會遭受遺棄。長沮、桀溺是《論語》中提到的人物，他倆「耦而耕」的避世態度，與孔子欲以仁愛濟世呈現鮮明的對比。⁴同時顯現農耕仍是亂世時的選擇。陶淵明則是東晉時期的隱士，其〈歸園田居〉提到自己「誤落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」，最終選擇「開荒南野際，守拙歸園田」。⁵歸隱處的特徵是「曖曖遠人村」、「野外罕人事」。⁶這顯露他掙脫世俗的限制，並躬耕邊遠荒地的情志，耕田也成了他往後的營生方式。

因此，人們可能因壓力逃離城市，但是若說放棄農耕而採原始採集和畜牧的生活，就可能以偏概全。

其次，我們仍需考量或許不是人人都有向國外尋求新生的需求。如果離實際邊疆遙遠，或向外遷徙成本過高，人民可能就無法向國外分散，而選擇在國內謀劃其他生存策略。對這部分，筆者認為出家或許就是一條可行路徑。比如明太祖朱元璋的早年經歷可見，在不堪天災和瘟疫肆虐的背景下，出家為僧可能為貧農的一時之選。⁷加上自南北朝以來，僧人、道士早已享有免除賦役的特權，大量人民都欲藉出家逃避賦稅。⁸甚至許多南北朝君主皆篤信佛教，造成佛教聲勢浩大，除讓寺廟積累大量錢財，亦間接帶動群眾出家的情形。不可諱言，其中也不乏假僧尼混充的情況。⁹

由此再探討人民的營生模式，就顯得益加多元，原始生活的情況就算不加以否定，但在版圖之內實際上卻有其他的生存機會；相形之下，採集、畜牧只不過是其中一種選擇。所以，所謂逃離國家謀取最佳生活的概念就須重新審視，

⁴ 謝冰瑩等，《新譯四書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9），頁 281。

⁵ 陶淵明著，逄欽立注《陶淵明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），頁 20。

⁶ 陶淵明著，逄欽立注《陶淵明集》，頁 20-21。

⁷ 趙毅、于寶航，〈從淮西走來的貧民皇帝朱元璋〉，《歷史月刊》263 期，（2009 年 12 月），頁 39。

⁸ 蔡慧崑，〈唐代儒學衰微的三個面相〉，《南亞學報》40 期，（2020 年 12 月），頁 284。

⁹ 李文才，〈南朝 480 寺，多少樓台煙雨中——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與社會〉，《歷史月刊》260 期，（2009 年 9 月），頁 61-65。

因為國家內部其實還有可供人民選擇的出路，逃脫國家的人民當然存在，可是並不能說只有國家之外，才有更好的生存機會。

從上面的分析可知，如果依照作者的觀點來解釋古代中國的人口移動，未免過於武斷。因為人民是否逃離國家，並且就以原始生活為業，難以妄下定論；在人們為了謀生的前提下，不能否認他們還有在國家內尋找出路的可能。

整體而言，本書所提供的歷史想像不能全盤推翻，它對歷史思維和史學領域開拓都有良好的啟發。作者深刻地對農業文明提出反思，反應人口集中連結農耕後帶來的危害；同時也說明國家本身的脆弱，而讓人群自主向外遷徙的可能。不過，作者在不少地方沒有考慮到細部的歷史差異，就對早期國家作寬泛的說明，進而造成論證不夠充分，甚或自相扞格的疑慮。因此若能明確討論主題，而不混談各文化的歷史，本書的核心概念才不易失焦，或發生論述不嚴密的情況。